



《布洛陀》与 民间叙事研究

黄伦生◎著

非外借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布洛陀》与 民间叙事研究

李海建著

广西
民族出版社
（南宁）



《布洛陀》与 民间叙事研究

黄伦生◎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洛陀》与民间叙事研究 / 黄伦生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218-11835-2

I. ①布… II. ①黄… III. ①壮族-史诗-研究-中国
IV. ①I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6939 号

BULUOTUO YU MINJIAN XUSHI YANJIU

《布洛陀》与民间叙事研究

黄伦生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卢雪华 胡扬文

封面设计: 李桢涛

责任技编: 周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180 千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目 录

导 言 / 001

第一章 叙事研究的民间文化拓展 / 006

理论建构：从民间故事到文人经典到文化民间 / 007

边界的划分：民间叙事与文人写作 / 019

中国民间叙事：南方与北方 / 028

第二章 以《布洛陀》为蓝本的民间叙事考察 / 034

作为民间叙事一个范本的《布洛陀》 / 034

《布洛陀》叙事的民间文化体系与族群个性 / 037

《布洛陀》史诗的基本情况 / 041

《布洛陀》研究大致情况 / 051

第三章 民族苦难意识与民间叙事结构 / 062

作为民间叙事动力的苦难意识：讲述与被讲述 / 062

苦难历程的集体记忆与叙事的线性结构 / 065

苦难之源的自然关注与叙事的矛盾设置 / 075

征服苦难的生命力量与叙事的矛盾平衡机制 / 083

第四章 民族宗教传统与民间叙事语境 / 090

以巫为主，道释兼容的民间宗教传统 / 090

道释的壮传与经文的世俗阐释 / 092

亦道（僧）亦俗的民间巫师与史诗的演述者身份 / 099

亦庄亦谐的民间史诗表演场语境 / 106

亦文亦野的巫经与民间史诗的吟唱性文本 / 111

第五章 民间教化习俗与民间叙事功能 / 114

口耳相传的壮族人文教化习俗与古壮字抄本的传承 / 114

壮族民间叙事的诗体文本与演述类型 / 116

《布洛陀》在壮族民间教化习俗中的叙事功能 / 122

第六章 民间口语意象与叙事语式 / 125

古粤西的族群交流与语言影响 / 125

民间生活化的口语词汇与叙事的写实性句式 / 127

以事寓理的修辞手法与叙事的隐喻性意指 / 133

程式化表达的诗性语言与叙事的意象群组合 / 136

第七章 民间叙事研究与口头文化遗存研究的理论启示 / 142

作为族群文化传承重要载体的口传叙事 / 142

民间叙事文本的民间性确认问题 / 144

族群语言个性保存与通约语言转译的文化认同问题 / 145

对以往民间口头叙事保存、整理和研究的检讨 / 148

结语 / 150

附录 I 壮汉民族宗教意识的构成与发展比较 / 154

附录 II 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生存空间 / 165

参考文献 / 174

后记 / 179

导 言

一、本课题研究的背景

本课题主要研究的是民间叙事问题，虽然目前民间叙事研究已日渐受到重视，但离“民间叙事学”的理论建构仍有很长的路程，首先寻找民间叙事的典范文本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布洛陀》这样一个文本的解读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该史诗文本的解读，探讨中国民间口传叙事的区域性、族群性以及原生特性的相关理论及分析操作，并以此为出发点，将文本分析所隐含的以往叙事学与口头诗学等理论观点方法的运用，探讨叙事学在本土化建构以及在民间口头作品研究拓展的可能路径。因此，本课题研究自然就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背景：

叙事理论的发展。《布洛陀》的叙事研究，不仅仅是叙事学理论方法在一个民间口传文本的运用，还涉及叙事学向民间文本的回归和拓展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普洛普至今，西方叙事学理论在80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民间文本研究到作家作品分析，由作家文本解读到理论体系建构，由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经典叙事学）到后现代叙事理论（新叙事学）的大致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新叙事学走出了形式主义自足文本的狭小天地，给予了文学以外的叙事形式及其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足够的重视，呈现了叙事学理论建构的一定的开放姿态。但总的看来，整个理论建构所赖以分析的叙事文本仍侧重于文人作家文本或类作家（如影视、电脑媒体创作等）文本，从而造成了对作为叙事学之先导的民间叙事的遗忘。因此可以说，迄今为止的叙事学仍主要是文人叙事学。叙事学可否走出文人或类文人的文本，重新唤起对民间叙事的关注，不仅是研究范围的拓展，也是研究理路的重新开放。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当代叙事学研究的触角尽管已经延伸至政治、法律、

后殖民理论乃至性别理论等，但其主体学术话语至今仍基本上延续着托多罗夫、热奈特等人的话语体系，并没有包容吸纳更多同时期的文学理论新成果，而类似帕里-洛德“口头程式理论”这样的同样源自荷马史诗研究的诗学成果，并没有进入叙事学的视野，究其原因，与叙事学对民间叙事的遗忘不无关系。

叙事研究的本土化趋势。叙事学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以后，沿着三大方向发展，一是西学成果译介和学理的解释，二是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解释中国本土作品，三是试图建立中国本土的叙事理论。三者各有侧重又有交叉，显示出了叙事学中国本土化的共同努力。但这一过程仍显露了与西方叙事学相同的特点，即关注的对象仍主要是文人经典。近年来，本土的“民间叙事”成为新的热点，这一点体现了中国叙事学的开放品格，但观念的倡导仍多于操作的实践。对于民间叙事文类以及叙述事象的研究，也只是刚刚开始。

民间文学研究的话语变革。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界致力于叙事学本土化的同时，中国的民间文学界也在作同样的努力。所谓“后钟敬文时代”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正在寻求对沿袭了近80年的民间文学研究话语的新的突破。其中叙事学（包括民间表演理论）与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理论”是学界近年来的关注热点。目前所取得的成果仍主要是两大理论的移用，在口承故事学、口传诗学方面有了一些新的成果，但在如何融合两者的理论方法，兼及书面文本和口头文本，拓展中国民间叙事的研究方面，仍有一个较大的探索空间。

《布洛陀》研究的拓展。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布洛陀经诗译注》和2004年八卷本《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问世以来，对该史诗文本的研究，几乎成为壮学研究的“显学”，研究的范围除了民族学、民间文学、宗教学、文字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传统学科以外，还逐步拓展到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应用领域。然而，作为以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为中心的一个民间文化系统，其众多的民间古壮字抄本，传达出来的壮民族的文化个性，都不是某一个学科领域所能囊括的。相比之下，叙事学研究就有一个优势，尽管所有手抄文本及其内容都呈现为一种弥散状态，但毕竟都是通过口头叙述及其书面文本的“固化”而存在，通过其口头

叙事传承的动力、语境以及语式等方面的探讨，可以较广泛地揭示《布洛陀》的族群文化个性。而这一角度的研究，迄今为止在《布洛陀》研究中还是一个空白。

二、研究的目标

本文的写作框架的设计，是以《布洛陀》的解读为中心，寻找民间叙事与口传诗学理论上的重合。总体目标是希望借助对壮族《布洛陀》麽经及相关民间叙事作品的解读，一方面拓展壮族文化研究的空间，另一方面，通过民间口传与书面文本、壮族与汉族等的比较相互参照，在认识壮族民间叙事的基本构成和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民间叙事传承的大致规律和研究上的基本理路。与此同时，民间叙事毕竟是一个范围广泛的领域，对于中国而言，区域性、族群性差异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亚于西方国别间的差异，本研究也希望对《布洛陀》的族群文化个性和区域性小通约语言的传承规律的分析，深化对中国民间叙事这一广泛领域的理解。此外，《布洛陀》作为民间口传史诗，具有相当典型的口头叙事的风格，如何同时兼顾其民间叙事和口传史诗的属性，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更具有兼容性，以体现文本分析与理论建构的相统一，本研究也希望进行一个操作上的尝试。

三、研究的意义

民间叙事理论建构。叙事学作为文学理论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如何在用以解释文人作品的同时，扩展到民间书面和口头叙事的解释，使叙事理论在新的层面上向民间的回归，从结构主义叙事学走向民间的和文化的叙事学，从而丰富和完善叙事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不断开放和中国本土化品格，使中国民间叙事研究从一般的理论横移走向自我建构，应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民间文学研究的变革。民间叙事方式作为民间文学流变中最具稳定性的因素，是民间文学的“民间性”的整体体现。本研究通过口头文本和书面文本的参照和对民间叙事模式的分析，探讨小族群口传文本向大族群通约语言书面文本转译过程中的得失，探究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民

间创作传统，一方面对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可以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另一方面对于解释在当今信息社会中都市与文人文化不断渗透甚至同化民间文化的情况下，是否还有、什么才是可资利用的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资源等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此外，叙事学、口传诗学等理论方法在民间文本分析上的综合运用，对于丰富民间文艺学的理论话语体系，也是有意义的。

口传文化遗产的保护、挖掘与研究。《布洛陀》虽然有丰富的手抄书面文本，但本质上仍属于口传文化范畴，它的传承和搜集、整理，是口传文化遗产挖掘、保护的成功个案。本课题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文本的解读，而是与文本传承、演述形式、文化语境等结合起来，从而揭示民间口传文化传承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因而对包括口传文化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都具有可资借鉴的参考价值。

四、研究的方法

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叙事学其实已经包含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释学、现象学等一系列文学观念和方法论，因此叙事学理论的运用，必然会涉及自形式主义以来的各种研究方法。其中的一些基本的理论范畴，将是《布洛陀》文本叙事分析的主要操作工具。必须说明的是，由于《布洛陀》不是单纯的文学叙事的文本，因此本文的分析不会局限于文本的文学性，而是较多地关注其宗教及教化习俗方面的语境，因此，严格说来，更接近文化叙事的分析，尽管目前叙事学理论中尚无“文化叙事”的确实表述。

口头诗学。主要是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理论”。这一理论不同于传统史诗文本的分析，在文学性上没有倾注更多的精力，而是主要关注民间口头创作的代际传承和口传文本的语法、句法习惯和表达传统等问题。当然，对于民间歌手的表演程式等的分析方法，也较具参考与应用价值。帕里及其后学的理论成果，对于《布洛陀》这样的民间口头叙事的分析，可以说具有其他理论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在具体分析运用中只涉及该理论成果的很少一部分。

民间文艺学。进入21世纪以后，民间文艺学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以来的民间文学的基础上有了大的扩展，除了民俗学、田野调查、口传文本的收集整理外，新媒体运用、口述史方法、表演程式、仪式理论等的综合运用也已成为趋势。民间叙事涉及口传文本问题，但同时也是一种表演，其中有族群口述史成分，因此，运用新的民间文艺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分析显然是必要的。当然，这些运用，主要还是体现在先前的田野调查过程中，而非仅仅在后期的案头工作中。

语言学。帕里-洛德的理论和结构主义无疑已经涉及语言学方法。但民间叙事除了一般语法、句法的结构分析以外，还会涉及民族语言或方言中的词汇、语法等内容，而这已更多偏重于方言学的范畴。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分析对于叙事学中的句法语式分析是一个很好的拓展，本文将有所涉及。此外语词的使用频率也是这一理论所关注的，它对于从平面或者横向的角度了解文本的语言程式风格是重要的途径，但本文可能更多地关注《布洛陀》文本基本词汇的抽绎水平，从纵向探讨文本的另一个层面的语言风格，尽管这种探讨不像“词频”分析那样，可以通过统计学的方法作出量性的概括。

比较方法。不管是平行比较还是影响比较，在书面文本与口头文本的比较，民间创作与文人写作的比较，小地域、小族群通约语言的文本与大地域、大族群通约语言的文本的比较，乃至中西方叙事理论、民间叙事模式的比较等各层面，都是必要的。本文在分析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说明《布洛陀》的族群文化个性，也将把汉民族的某些相类似的文本作为主要的参照系。

其他可能涉及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由于本课题分析的重点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民间叙事文本，而这些文本的产生都与其族群的生存环境、历史与传统文化、宗教观念等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过程中还可能涉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尤其是田野调查）等学科与方法，尽管它们事实上有着许多融合和交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布洛陀》本质上属于民间宗教的经文，而这种宗教与道教、佛教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因此宗教学方面的分析将有所侧重。

第一章 叙事研究的民间文化拓展

尽管本课题研究的具体对象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遗存，所涉及的主要是带有民族史诗和民间宗教性质的诗歌体文本，但毕竟不同于以往的单纯的文学或者宗教的，或者是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研究，而是试图从叙事学的角度，从民族民间文化的整体把握上，寻找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一个民族具有“元叙事”意义的要件。作为本文写作的一个理论准备和逻辑出发点，我觉得有必要首先对迄今为止的叙事学有关问题作一个简单的分析描述，这既是本文写作的一个理论背景，也是可以确认本文写作意义——尤其是民间文化叙事理论建构的意义——的一个参照。

民间文化叙事无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叙事学理论建构的大致走向，西方的理论发展和中国本土的努力。这实质上是民间文化叙事的理论拓展如何成为可能的一个前提。当然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叙事学理论发展轨迹，不是本章描述的重点，而且这个方面的工作，国内外的学者，例如美国的戴维·赫尔曼、德国的莫妮卡·弗卢德尼克等在《叙事理论的历史》等文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① 我这里只想对叙事理论在其发展中，对于不同文本的关注重点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其次是民间文化叙事与文人写作叙事的区别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两者的边界，同时关系到民间文化叙事一些基本要件的理论操作。最后是民间文化叙事的民族性和区域性问题。不同的区域、民族由于语言、文化、教育及历史传承的差异，其民间叙事也由于历代官方主流文化和文人写作影响、渗透的程度不同，其“民间性”的程度也有所不同。这个问题的理解，直接关系到作为民间文化叙事的“标本”的材料文本的选择。

^① 参见 [美] James Phelan Peter J. Rabinowitz 主编，申丹等译：《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西学的译介，还是本土的建构，对于“叙事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仍不完全统一，部分学者也在使用“叙述学”这一表述。在我看来，尽管“叙事学”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同时兼顾到叙述者、叙述对象、叙述行为和叙述过程几个方面的关系，而“叙述学”更多关注叙述过程和叙述行为本身，但无论如何，任何叙述都会涉及“谁在叙述”、“叙述什么”和“怎样叙述”的问题，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两者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如果没有特别的界说，本书也把它们当作同一个概念来使用。

理论建构：从民间故事到文人经典到文化民间

一、从民间故事到文人经典

叙事理论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经过近8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体系成熟、影响广泛的文学理论学科。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普洛普开始的。俄国学者普洛普1928年出版的著作《民间故事形态学》通过对近二百个俄罗斯童话故事的分析比较，概括出了故事人物的三十一一种功能和六个不同的阶段，被学者认为是叙事学的开山之作：“普洛普在童话分析中所提出的这一功能概念对于现代叙述学具有重要意义，它促进了对于叙述文本的结构分析，并成为许多其他有影响的叙事结构模式的出发点。”^①但普洛普的研究，事实上却引发了两条不同的研究道路，从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学科：故事类型学和叙事学。托多罗夫一直被认为是继普洛普之后叙事理论建构的重要人物，其《〈十日谈〉的语法》被认为是标志性的作品。托多罗夫也认为，他的《〈十日谈〉的语法》（*Grammaire du Décaméron*）一书就是为叙述学的建立而写的。他说：“……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作品

^① 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的科学。”^① 托多罗夫对《十日谈》的分析，推动了叙事学的发展，同时也将这一学科引向了文人经典的道路，尽管《十日谈》为薄伽丘所创作，但其中许多故事也来自于民间，其中包括历史事件、中世纪传说和东方民间故事等（如《七哲人书》、《一千零一夜》等），也可以说是文人作家对民间故事的再创作。而托多罗夫选取《十日谈》为分析的文本，也就有着秉承普洛普关注民间故事的遗风，只是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是索绪尔语言学 and 法国结构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托多罗夫的《〈十日谈〉语法》，也是民间故事叙事学向文人创作叙事学的一个过渡。但在此前一年，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诗学》（*Poétique*）的第二章《文学作品分析》中，运用语言学的原理，阐述了结构主义诗学的理论要旨和分析方法，具体解释文学作品的“语义范畴”、“语域”、“语式，时态”、“视角，语态”等问题时，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文人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等等，几乎没有民间作品。^② 因为《诗学》特别是《文学作品分析》一章，是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相关概念和方法范畴的解释，作品分析不是它的重点，而《〈十日谈〉的语法》则可以说是将他的概念和方法运用于具体作品分析的操作范例。此后的许多叙事学理论家在他们的研究当中，也基本上沿续了托多罗夫的这一理路，只不过在分析具体作品时，或集中或分散，前者较典型的是热拉尔·热奈特，他的《叙事话语》（1972），就主要以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为分析文本，正如作者在该书的《绪言》中开宗明义说的：“本书研究的特定对象是《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叙事。”^③ 而且重点分析作品叙述的时间问题。

文人作品尤其是小说，是叙事文学的典型样式，叙事理论的出现，

① [法]托多罗夫：《〈十日谈〉的语法》，见张寅德编：《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② 参见[法]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见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

③ [法]热拉尔·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主要还是针对当时的法国小说的创作及其批评，是在20世纪初产生于俄国并于五六十年代在欧美产生影响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研究的旨趣仍在于建立一整套用于小说作品的批评分析的方法和话语体系，因此文人小说的文本分析自然就成为关注的重点。其对于小说叙事内部结构分析的方法和话语操作，的确也极大地拓展了小说批评的理论空间。正如华莱士·马丁（W. Martin）在他的《当代叙事学》（*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1986）所说的：“在过去十五年间，叙事理论已经取代小说理论成为文学研究主要关心的论题。”^① 研究对象或者分析文本的关注，也就决定了其理论建构的基本属性，我姑且把这种以小说为核心、以文人文本为重点的叙事研究称为“文人叙事学”或者“作家文本叙事学”。

二、从经典叙事学到“新叙事学”

90年代以后，随着叙事学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一大批新的成果，并且形成了所谓的“后现代叙事理论”或“新叙事理论”。对于此前的叙事学，特别是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或称“经典叙事学”），有学者认为：“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从文本外部转向文本内部，注重科学性和系统性，着力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众多叙事学家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小说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提高了欣赏和批评小说艺术的水平。然而，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流派，经典叙事学在阐述作品时，有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它在不同程度上割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这种局限，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的研究朝文本外的社会意识形态转向。但是很快，这种转向不仅受到学界的质疑，而且也激发了对叙事学重新关注的热情，新的叙事学成果大批涌现，这就是所谓的“新叙事学”。新叙事学除了对经典叙事学以来的理论进行纠偏以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有的学者聚焦于偏离规约的叙事现象、新的

^① [美] 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叙事（次）文本，以及以往被忽略的叙事现象和叙事文类。……关注不同媒介和非文学领域，电影、音乐、歌剧、法律、人物像、古典器乐、数字化叙事等等均进入了研究的视野。”^①

从经典叙事学到新叙事学的转变，不仅仅是方法、观念的转变，还意味着解释对象、领域的扩展。这种扩展使得叙事学有着明显的泛化趋势，也具有“文化”的意味。但从《当代叙事理论指南》以及“新叙事理论译丛”的几本论著看，所涉及的叙事现象和文类，除了作家的文学作品（如《尤利西斯》、《大卫·科波菲尔》），其余大部分也都属于文人创作作品，如新叙事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费伦，在其《作为修辞的叙事》中，把对作家文本的分析看做是重要的选择，还列出了一长串名单：“本书的重要性也在于所研究文本的范围：约瑟夫·康拉德、凯瑟琳·安·波特、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洛里·穆尔的短篇故事；威廉·M. 萨克雷、弗吉尼亚·伍尔夫、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托尼·莫里森的长篇小说；以及丹尼什·德苏扎对当代校园生活的非虚构讲述。”^②

总而言之，文人作家或类作家创作的文本，仍是新叙事学重点关注对象。

因此，叙事学在西方八十载的发展，尽管几经周折兴衰，但研究对象从民间走向文人，仍是其基本路径。

三、从西学转译到本土建构

作为早期叙事学成果的民间故事类型学的引进与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已经开始，虽然成果不多，至今仍沿着其原本路径发展。应该说，真正的叙事学理论则是在8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译介引进，以“叙事学”、“叙述学”等冠名的译著，几乎都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

^① 参见 [美] James Phelan Peter J. Rabinowitz 主编，申丹等译：《当代叙事理论指南》总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② [美] 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作为修辞的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国内出版。90年代开始，逐步出现了本土理论家在介绍、吸收西方叙事学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理论专著，较重要的有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1997）和《叙述学》（2001），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1998），谭君强的《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2002）等。其中，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是针对“文学是否可以通过逻辑与数理逻辑通约”的问题，试图在“让逻辑回归文科，并携带数学进入文学”方面来“一场革命”，作者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这需要踏踏实实地完成三个步骤：（1）阐述艺术逻辑的基本原理；（2）总结每一细节的逻辑公式；（3）将逻辑公式数学化”。对于艺术逻辑原理，作者把它分为三个部分：“因为语言符号携带了三个方面的信息：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而能够贯通三者、驾驭三者的是逻辑。我称之为‘叙事艺术逻辑’，简称‘艺术逻辑’”。^①该书分析艺术及艺术逻辑的起源、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了艺术推理的基本原理，并总结了一整套艺术逻辑的公式。该书虽冠以“叙事”，但正如作者所言，主要还是讨论“艺术逻辑”问题。而在另一本书《叙述学》里，作者才真正进入叙事学理论，其中包括基本范畴、语态语式、结构等问题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与托多罗夫、热奈特等相似。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叙事理论研究的成果之一。该书在介绍西方叙事学和文体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叙事学的‘话语’与小说文体学的‘文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综合采用了叙述学和小说文体学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对这两个层面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以帮助提高欣赏、评论和分析小说的水平。”^②因此，该书的着眼点主要在小说文体的叙事问题上。谭君强的《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主要是介绍西方叙事学理论成果。

在经历过一个时期的西学转译之后，国内的学者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有着一个与西方迥异的叙事系统，因而也就应该有自己的

^① 董小英：《导论》，《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1页。

^②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